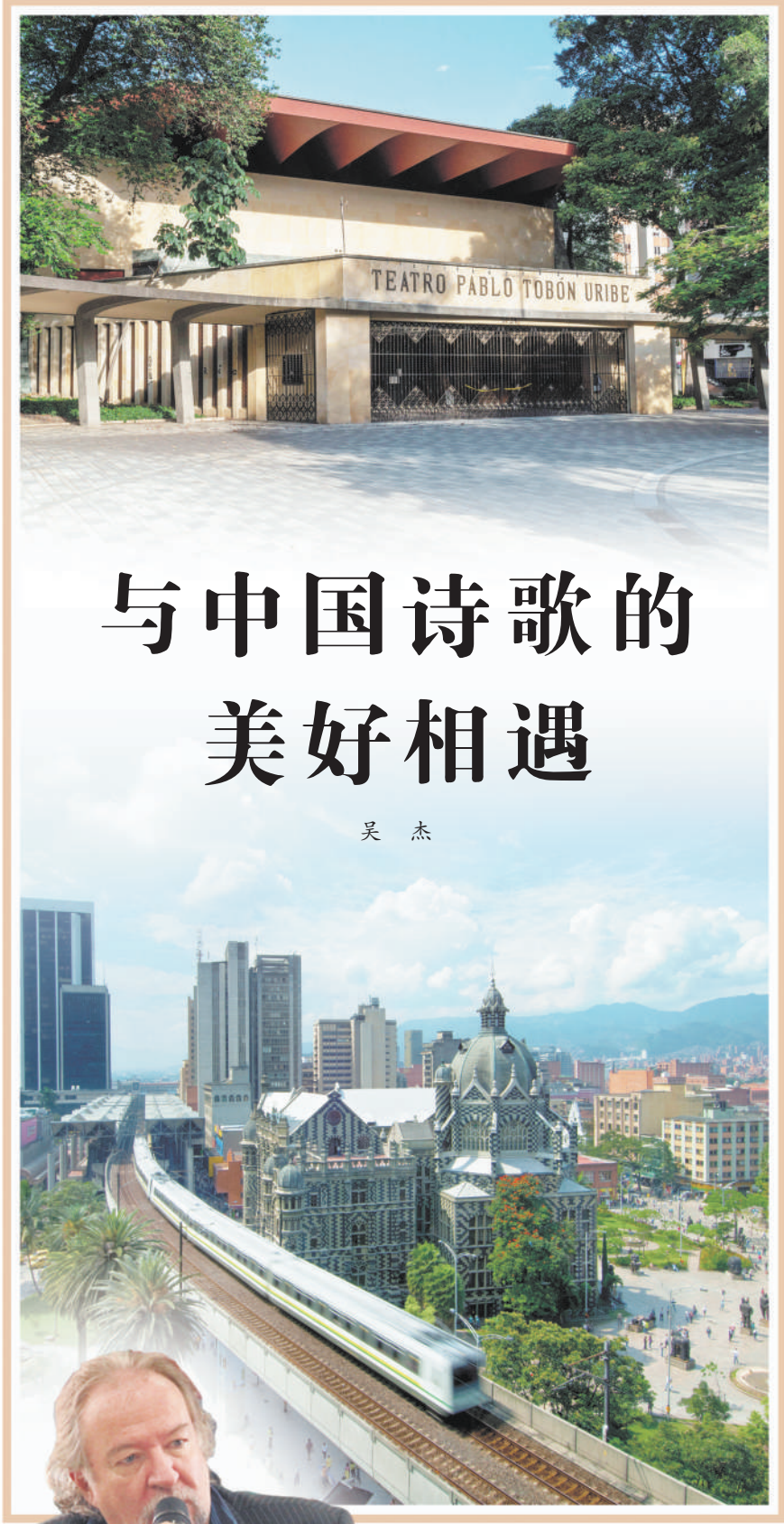


海客谈神州



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有着超过30年举办国际诗歌节的历史。它是拉美地区最大的诗歌盛会，被誉为世界三大诗歌节之一。对于相距万里的中国人来说，那里是诗与远方的重合之地。

费尔南多·伦东是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组委会主席，也是诗人、诗歌杂志主编。他与中国、中国诗歌、中国诗人联系颇多，曾多次跨洋访华，寻游诗圣故地，以诗句书写中国。

中国诗歌回荡在麦德林

“从1994年至今，我们邀请了30余位中国诗人。在剧院、大学、公园、图书馆、社区和城市广场上，中国诗人朗诵了400多首自己的诗作，中国诗歌回荡在麦德林。”提及诗歌节与中国诗歌，伦东如数家珍，对首次在麦德林诵读的中国诗作蕴含的意境，也仍有印象。

都曾有哪些中国诗歌回响在麦德林的山坡绿地、楼宇厅堂呢？伦东向我展示了一份视频链接网址，我看到中国诗人朗诵自己的代表作。其中有高洪波朗诵《彩色的梦》、舒婷深情诵读《读给妈妈的诗》、杨克从广东带来《信札》、周瑟瑟抑扬顿挫地读着《林中鸟》、赵丽宏儒雅地用《我的影子》和现场观众交流、梅尔以南美题材的《马丘比丘》与观众拉近距离……不同年代、不同题材、不同风格，这些当代诗歌作品呈现出中国特色。

让中国诗歌在麦德林吟诵，是出于什么缘由？伦东告诉我，作为诗人和中国诗歌的读者，作为国际诗歌节的负责人，他非常关注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中国是诗的国度，杜甫、李白、王维等众多中国古代诗人，在诗歌史上星光闪耀。另一方面，被翻译成西语版本的中国当代诗歌仍然较少，我们渴望了解中国诗歌在当代的发展现状。”伦东认为，在麦德林出现的中国诗歌作品群，具有诗歌的自然属性和本质特性，是世界诗歌舞台上重要的话语表达。

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以场面大、观众多著称。每年夏季举行的开、闭幕式都是大型朗诵会，在类似露天剧场的公园坡地举行，吸引约上万观众。诗人周瑟瑟和翻译家孙新堂都曾向我提起，在朗诵中国诗歌时，观众认真倾听，以掌声热烈回应，尽显美国人的浪漫和热情。伦东说，麦德林的听众由成千上万不同年龄段的人组成，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怀有不同精神信念。面对中国诗人的朗诵，他们都怀着极大兴趣和尊重，默默倾听，真诚地报以掌声。中国诗歌凝聚着深刻内省、悠长回忆以及深深敬意，打动了哥伦比亚的诗人和观众。

此外，中国诗歌对追求和平、保护自然、倡议平等的呼唤也给诗歌节带来清新积极的元素。伦东说，哥伦比亚《时代报》《观察家报》《哥伦比亚人报》和当地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也对中国诗歌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为来访的中国诗人制作了精彩报道。

中国诗人带来清新诗风

在进入不惑之年的1991年，伦东携手几位文化界同仁创办每年一届的麦

图①：曾举办麦德林国际诗歌节朗诵会的巴勃罗·托翁·乌里布剧院。图②：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图③：费尔南多·伦东。资料图片

德林国际诗歌节。30年间，诗歌节迎来17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700名诗人，中国诗人从第四届开始亮相。

对于远道而来的中国诗人，伦东热情相迎。不少中国诗人在文章中提到伦东，如赵丽宏称他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以惊人的耐性和魄力，给麦德林带来诗意飞扬的感人气氛。在中国诗人眼中，伦东满面红光、强壮豪迈、激情洋溢，常常竖起大拇指指向他们致敬。

伦东首次接待的中国诗人是晓雪和孙友田，那是1994年，麦德林诗歌节上第一次传出中国诗歌的韵律，主

题是诗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国诗人情感丰富、清新隽永的诗风令他耳目一新。之后，中国诗人们陆续来到麦德林。

伦东提到，2013年，中国诗人代表团参加了在麦德林举行的“龙腾诗歌谷——中国、哥伦比亚诗歌国际对话”。除了在城市的不同地点朗诵诗歌，双方还共赴位于圣达菲的考卡河，一起走过建于1895年的291米长悬索桥。主办方奏响了动听的哥伦比亚民间音乐，中国诗人也跳起风靡拉美的萨尔萨舞。在这次对话活动中，中国诗人同许多哥伦比亚同行进行了

友好交流。

回顾与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交往，伦东谈了很多。吉狄马加曾经在麦德林深情朗诵诗歌，展现了彝族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蓬勃的生命力量，令他印象深刻。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的盛况也令吉狄马加触动良多，他说：“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聚会，能像一个诗歌节那样给和生活带来如此多的希望和梦想。”

伦东说，吉狄马加是中国诗人与世界诗人对话的促进者，他推动创立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等诗歌交流活动，促进世界诗人之间建立牢固联系。“2020年，吉狄马加原计划随中国诗人代表团参加第三十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虽然新冠肺炎疫情阻止了我们相见，但哥伦比亚民众至今还记得他1997年参加诗歌节的情景。我们在线上播放了众多中国诗人当年朗诵诗歌的视频，吉狄马加在云端参加了第三十届诗歌节，进行了诗歌朗诵，观众反响热烈。”

因翻译家说

“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一份职业”

米拉·艾哈迈德

人类使用的语言有很多种。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传统、文学和历史，人们以书面形式将其表达并记录下来。如何使这些文字记录在不同国家和民族间流传是个难题，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语言能令世界上所有人都读懂。于是，翻译的重要作用便体现出来，即以不同语言传播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

我认为，在众多翻译门类之中，文学作品的翻译难度最高。一个译本是否优秀，原著的艺术水平很重要，译者的翻译能力也起到决定作用。高水平翻译家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除了需具备两种语言的表达能力，也需尽量坚持原作风格和写作手法，诚实并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文化背景和思维特征。正如茅盾曾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文学翻译者犹如管弦乐队的指挥，

要协调不同乐器，在独奏与合奏间切换，最终翻译而成的文学作品才能成为一件难得的艺术品。那么，想成为一名杰出的文学翻译者，要具备哪些条件？第一，译者需对文学非常了解，熟悉各种文学体裁，掌握其他国家的文化常识；第二，译者要精确传达出作者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令读者感受到文本的生命力；第三，译者常常要面对一个包含了杂糅文体、各类文化和久远历史的文本，因此最好对相关领域有所研究，且具有文学才华，才能创作出等同原作思想水平与艺术技巧的译作。

在翻译中国作家王蒙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时，我常常感到不能停留在直译原文的层面，而是要充分理解原作、切身体会到作者创作时的感受，在这一基础上准确地进行翻译，确切地传达作者意图。就像傅雷所说，翻译重形似，如伯乐相马，“重神似，不重形似”。这其实对译者提出相当高的要求，需要他们不仅能够翻译词语、遣词造句，同时还要能够传递情感，让读者

获得如阅读母语般的顺畅体验。

文学作品中往往有生动、鲜活的比喻，如何将这些比喻通过翻译传达给另一种语言的读者，对译者的词汇量和感受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是翻译过程中的一大挑战。我在翻译毕飞宇的《推拿》时，发现这部小说充满比喻，为了更好地感受原作中盲人按摩师的世界，我在翻译时戴上墨镜，尽量感受盲人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内心世界。最终翻译而成的阿拉伯文版《推拿》获得2017年埃及《文学消息报》最高翻译奖。这种感受力还体现在译者要对作者在创作时所经历的心理和情感历程有所体会，这不仅需要感觉敏锐，还需要想象力，在翻译诗歌时尤其重要。

如何寻找好作品并获得版权是我在翻译中国文学时面临的一个问题。许多译者都希望找到反映中国和中国人真实面貌的优秀作品，常常更重视名家名作，而忽略了一些虽优秀却并不出名的作家和作品。我认为，真正优秀的

文学译者需从作品本身出发，寻找中国文学的“瑰宝”，将其呈现给阿拉伯国家的读者，让他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文学翻译可以丰富语言，可以传递思想。读者通过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了解其他异域文化，久而久之，更容易理解与之不同的世界。通过阅读世界各国文学作品的译本，读者可以了解人类共通的和普遍关注的问题，感受一些人的特殊经历，从而促进社会各群体间的相互理解和不同价值观的相互分享。对我而言，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心灵疗愈和生命体验。

米拉·艾哈迈德，埃及青年翻译家，1985年生，毕业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专业，翻译出版鲁迅短篇小说集《狂人日记》、毕飞宇长篇小说《推拿》和王蒙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等中国作家作品。2017年，她所翻译的《推拿》获得埃及《文学消息报》最高翻译奖。

经典流芳

在音乐中聆听时代交响

刘益珅

在音乐史上，肖斯塔科维奇作为一名交响乐和室内乐作曲家在20世纪占据了重要地位。他的作品简洁凝练，是传统调性音乐语言的延伸，吸收了从古典主义至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精华，体裁丰富、风格多样。在20世纪先锋派林立的音乐界，肖斯塔科维奇更愿追随历史的余韵。他虽然也汲取过序列十二音作曲技术，将新兴的爵士乐元素引入作品，却仍坚持自我，寻求音乐本质，探索永恒问题——生与死，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等，可以说，他的音乐体现了几代人乃至一个国家的时代轨迹。

追求思想性同时保持高艺术水准

肖斯塔科维奇一生创作颇丰：15部交响曲、15首弦乐四重奏、小提琴、大提琴及钢琴协奏曲、大提琴奏鸣曲、钢琴五重奏、歌剧和舞剧若干。除此之外，他还为100多部苏联电影配乐。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音乐创作的一座高峰。作曲家的交响曲命名均以苏联时期的事件为标题，与艺术创作合二为一，在追求思想性的同时保持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早期作品如《第二交响曲》(1927年)和《第三交响曲》(1929年)分别取副标题为“十月”和“五月一日”，展现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蓬勃的乐观精神。中期作品《第七交响曲》(1941年)、《第八交响曲》(1943年)和《第九交响曲》(1945年)是作曲家在二战初期被包围的列宁格勒创作的，都是纪念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佳作。《第十一交响曲》(1957年)和《第十二交响曲》(1961年)的副标题分别为“1905年”和“1917年”，以纪念1905年俄国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

评论家认为，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在技术上相当杰出，一方面因为作曲家个性化的创作使然，例如在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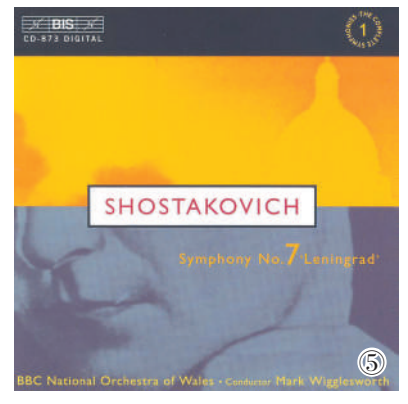


调性环境中创造了一个调性曲式的功能；另一方面，每部交响曲都有其特定的管弦乐语言，它们虽然隐含着体裁的风格转变，但没有一部是重复的。作曲家以革命性的新艺术表达去呈现苏联社会的变化，管弦乐风格的演变与所处的社会事件联系密切。例如在创作早期，肖斯塔科维奇在运用高度色彩化配器组合的同时，以自由的复调手法发展主题，使音乐更具有爆发力。而在创作晚期，作曲家加强了个别乐器的处理和合奏用法(例如打击乐)，更关注不同和声与音色的混合效果。肖斯塔科维奇在交响曲中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实验，其作品常常带有戏剧性效果，体现力量的冲突。聆听其作品有很强的图像感，能够产生战争重现般的视觉通感。

二战中诞生的传奇名曲

在众多作品中，肖斯塔科维奇于1941年创作的《C大调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作品60号)令他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一部凝聚了苏联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必胜信念的交响曲。正如作曲家所言：“我希望在战争中塑造这个国家的形象，并将其印刻于音乐中。”

《第七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15部交响乐中篇幅最为长大、蜚声国际的作品。它由4个乐章构成，其中“调性”和“主题”依然是音乐曲式确定的因素。《第七交响曲》的标题十分鲜明，4个乐章分别以“战争”“回忆”“祖国辽阔的大地”以及“胜利”为题，为听众指明具体形象，增强乐曲的画面感。这些主题或以调性方式体现，融合了大小调和中古调式；或以无调性呈现，在古典的框架里迸发出革新的



力量。由于奔放的生命感，特别是反法西斯的顽强抗战与必胜信念，《第七交响曲》在全球的传播可以用“星火燎原”来形容，迅速在全世界奏响，铺展了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战争的壮丽图景。

《第七交响曲》的诞生过程颇为特殊。1941年底，列宁格勒陷入德军包围，身为作曲家的肖斯塔科维奇参与了保卫战。他加入消防志愿兵并在炮火连天的艰苦环境中完成了《第七交响曲》。这部作品于1942年3月5日在萨马拉进行了全球首演，引起轰动。为了让这部曲子能在列宁格勒公演，1942年8月9日，苏联召集为数不多的幸存音乐家，在围困中演奏了献给这座城市的交响曲。为了防止德军炮击音乐厅并保证演出正常进行，苏联红军甚至事先发射了数千枚炮弹压制敌军的进攻节奏。因此，《第七交响曲》成为一部罕见的由军方“保驾护航”的交响乐，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国家意义。

《第七交响曲》问世不久，其乐谱微缩胶片还被空运到海外，启动了世界巡演，获得了跨越国界的成功，鼓舞了饱受战争摧残的各国人民，也为苏联筹集到大量抗战资金。特别是1942年7月，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在纽约进行了《第七交响曲》的美国首演，随后一个季度内，该作品在全美巡演就高达60场。托斯卡尼尼还和英国指挥家亨利·伍德爵士通过广播向数百万抗战同盟国听众播放了这部交响曲，引发更广泛关注。这部在战火中诞生的作品给同盟国听众传递出这样的信号：作曲家在列宁格勒被炸毁的危险中都能写出如此磅礴大气、正义凛然的交响曲，纳粹不会也更不可能获胜。由此，头戴消防帽的肖斯塔科维奇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抗击法西斯的“时代人物”。

艺术家常被时代赋予各种美誉与标签，把这些一一拂去、细细体味，往往才能理解究竟是什么让其人、其作品能够与时间相伴而行。岁月流逝，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并未因其具有的时代特性而削弱了艺术价值，反而因凝聚了人类共同的情怀尤显隽永。时至今日，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依然是音乐史中的独特篇章，因代表人类英勇不屈的反法西斯精神而永存于世。

图④：《第十一交响曲》专辑封面。图⑤：《第七交响曲》专辑封面。资料图片

